

教育研究集刊

第五十六輯第二期 2010 年 6 月 頁 1-40

傳統學術轉型或是西方學術延伸？ ——五十年來《教育研究集刊》哲史 類論文在我國近代教育學史上的意義

劉蔚之

摘 要

本研究分析 50 年來《教育研究集刊》中的「教育哲史類」論文，並將之做為臺灣教育學發展的重要史料文獻，進行歷史探究。首先，本研究說明該類論文數量與主題分布；其次，就當中對於臺灣教育學發展過程中具關鍵性影響的六項問題，分析文章內容：一、當代臺灣教育學與近代中國大陸教育學間有無歷史性的承續累積？二、教育哲史類論文有無現實關懷？三、傳統的中國教育文化如何發揚與轉型？四、引進西方學術有無審慎轉化態度？五、方法論上對教育學研究進行哪些自省？六、接受西方學術過程中有無遭遇適應困難？最後，再從「傳統學術轉型或是西方學術延伸」角度，探究這些論文中所呈現我國近代教育學之發展特性與問題，進而舉例逼近本研究預想之融合中西文化的「臺灣教育學理想學術造型」，冀能形成學界未來相關對話的討論基礎。

劉蔚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電子郵件為：camino@ntnu.edu.tw

投稿日期：2010 年 1 月 5 日；修改日期：2010 年 4 月 2 日；採用日期：2010 年 5 月 12 日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BER/?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2 教育研究集刊 第 56 輯 第 2 期

關鍵字：教育研究集刊、教育學史、教育哲學、教育史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June, 2010, Vol. 56 No. 2 pp. 1-40

Historical Review of Articles on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Published in the Past Five Decades

Wei-Chih Liou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articl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published i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NTNU between 1958 and 2008. This historical review explores whether the development of pedagogy in Taiwan after 1949 continued the pre-1949 Chinese pedagogy, whether the pedagogy in Taiwan faced a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dilemma, how such confrontation was reflected in the articles, and what the future ideal pedagogy in Taiwan would be. It is concluded that an ideal pedagogy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for Taiwan should combine educational theor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essence of Chinese/Taiwanese culture.

Keyword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NTNU), educational history, educational philosophy, history of education (Taiwan)

Wei-Chih Lio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camino@ntn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Jan. 5, 2010; Modified: Apr. 2, 2010; Accepted: May 12, 2010

壹、前言

在西潮東漸、西力衝擊下，中國於 1902 年建立「壬寅學制」，正式頒布新式教育制度，從此起算，中國近代教育學發展已超過百年，而西方教育理論與制度、方法與工具的學習，乃至移植，則是這一百多年間相當顯著的特色。若以 1949 年為界，一百多年來，教育學發展約可分為兩階段：1902 年晚清至 1949 年中央政府遷臺，源自近代西方形制的教育學從「無」到「有」，期間歷經數次重大斷裂與重新建置，每次的重新建置，無論內容或發展方向上，大多缺乏累積與傳承。至於 1949 年迄今，在中國大陸方面，出現多次研究路線或典範的崩裂與轉移；而臺灣方面，則進入一段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

1949 年至今 60 餘年間，臺灣教育學是如何開展？其與 1949 年之前的中國大陸教育學之間，究竟有無歷史性承續累積？其所根據的文化價值與理想、研究的問題意識、動機與目的，或是學科發展內容、工具與方法，主要來自傳統中國教育文化思想之轉型與再造，抑或西方學術的純粹延伸與應用？臺灣教育學未來應有的理想學術造型，又該是如何？這些問題的釐清，對臺灣教育學自我的歷史性認識與前瞻性共識之形成甚是關鍵，然而，至今仍未獲足夠的關注與行動。

本文分析《教育研究集刊》（以下簡稱《集刊》），1958 年創刊時，主要是保存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學位論文或學生學期報告之刊物（教育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1959：例言），直到 1992 年才不再直接刊登學生的學位論文（或其摘要），1997 年轉型為公開徵稿、採匿名審查制之嚴謹學術刊物；2000 年起，列入國科會 TSSCI 資料庫迄今。就與時俱進的發行歷史、刊登文章水準、發表人學術影響力，或編輯委員會組織運作、晚近公開嚴謹的審查標準，以及發行機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所）在臺灣教育學術研究地位等而言，《集刊》堪稱為 50 年來臺灣教育學發展上最重要的專業性刊物。本文將就歷年所刊「教育哲史類」論文，做為臺灣教育學發展重要史料文獻，進行內容分析，並形成立論基礎，嘗試回答下列問題：

一、哲史類論文數量與比重如何？有無隨時間演進而有增減之趨勢？在研究主題與對象方面，是否有所偏重？

二、哲史類論文著重引進介紹（延伸）外國教育歷史與哲學思想，或是整理發揚（轉型）傳統中國固有教育學術？具有將這兩種工作融合的問題意識與企圖心嗎？或只是兩條平行軌道而無交集？

三、若與 1949 年之前，近代中國教育學曾開展的相關內容及成果相較，哲史類論文是否有所傳承、累積與進步？是否反映出我國近代教育學建立與發展史上的機會與侷限？具有何種歷史意義可供未來發展的借鏡？

至於本文時間斷限，則以 1958 年《集刊》創刊為開始，2008 年《集刊》滿五十週年之際為結束，希望在此特殊時間轉折點上，進行歷史回顧與整理，並放眼未來，找出我國教育學理想發展之路。

貳、哲史類文章的數量與主題分析

以下先就全部教育哲史論文在各輯各期中所占比率進行統計與分析，之後再區分教育史、教育哲學兩領域，探究個別情形。

一、教育哲史論文的數量

由表 1 可知，過去 50 年間，教育哲學（179 篇）與教育史（41 篇）兩類論文合計共 220 篇，在《集刊》全部 773 篇論文中，約占 28%。這樣的比率究竟是高或低？若教育學科之次領域以教育哲史、教育行政、課程與教學、教育社會學歸類比較，教育哲史占 28% 應不算低。

表 1 教育哲史論文占總篇數的比率¹

出版時間	1958-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08	合計
輯次	1-12	13-22	23-32	33-45	46-54	54
總篇數	86	159	202	132	194	773
教育史論文篇數	9	2	7	12	11	41

¹ 以下各統計表格中的百分比數字，均經四捨五入法取得整數。故總百分比會有少數不一致情形出現。

6 教育研究集刊 第 56 輯 第 2 期

表 1 教育哲史論文占總篇數的比率（續）

出版時間	1958-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08	合計
占總篇數百分比（%）	10%	1%	3%	9%	6%	5%
教育哲學論文篇數	54	34	23	36	32	179
占總篇數百分比（%）	63%	21%	11%	27%	16%	23%
哲史類合計占總篇數百分比（%）	73%	23%	15%	36%	22%	28%

然而，分別來看，教育史領域論文總共 41 篇，數量明顯偏少。除了《集刊》發行早期（1958-1970 年）因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偏重哲史，故占 10% 外，1970 年後開始遭逢量化研究典範之挑戰，²1971～1980 年間，總共只有兩篇教育史論文，占總數 1%，1981～1990 年也只有七篇，占總量 3%。這種銳減窘況，一直要到 1990 年後才稍得改善。或許受到質的研究方法對量化研究之質疑挑戰，以及教育學方法論的探討日增，得以逐漸累積對不同研究典範客觀看待優缺點的共識，1991～2000 年回升為 9%，2001～2008 年則只有 6%。整體言之，50 年來教育史論文比率之起伏頗大，歷年平均為 5%。

至於教育哲學類論文，數量比起教育史類略勝一籌。50 年內共發表 179 篇，是教育史論文的四倍以上。《集刊》發行早期（1958-1970 年），比率甚且曾高達總量的 63%。但這種不尋常的高比率很快在 1971～1980 年銳減到 21%，甚至在 1981～1990 年間，更減少到只有 11%。直到 1990 年代，才又回升至 27%。2001～2008 年則是 16%。50 年來教育哲學類論文數量占《集刊》總論文數量之比率平均為 23%。

² 這種趨勢符合伍振鶯與陳伯璋（1985）所指陳，1970 年代，行為科學的發展（特別是心理學）對教育學有相當大的衝擊，所以教學與輔導方面論文幾乎占教育學博碩士論文的一半，並廣為採用調查法、實驗法等相關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符應簡成熙（2005）對臺灣教育哲學發展的觀察，1970 年代以後，整個教育學研究趨向量化研究典範，教育哲學之發展反不如 1960 年代熱絡，且這種現象持續到 1980 年代中期，並無太大改善。

二、教育史研究部分³

由前可知，50年來教育史論文數量並不多，總共41篇，比率僅占總數5%。這41篇論文究竟包括哪些研究領域？在表2中，可看到以中國教育史占多數，計有19篇（約46%），其次是外國教育史11篇（約27%），再次為臺灣教育史5篇（約12%）。至於中外教育史合論、教育史學，則各占3篇，都是7%，比率最低。

表2 教育史研究領域分析

類別	中國教育史	外國教育史	中外教育史	臺灣教育史	教育史學	合計
數量	19	11	3	5	3	41
百分比(%)	46%	27%	7%	12%	7%	—

可進一步分析的是，中國教育史、外國教育史、中外教育史、臺灣教育史四類（亦即不含教育史學）總共38篇研究中，又是以何種主題為多？由表3可知，在中國教育史方面，以「制度與政策」最多，22篇中占13篇（59%），可能原因是中國教育的「制度與政策」主題較為具體明確，史料較易掌握；此外，由於《集刊》大多數討論中國「思想與人物」的論文欠缺對歷史脈絡之探討，本文將這些論文劃歸為教育哲學類，遂更為凸顯「制度與政策」的比重。

表3 教育史研究主題分析（不含教育史學）

主題 數量 領域	通論	制度與政策	思想與人物	運動與活動	合計
中國教育史	5	13	1	3	22
臺灣教育史	1	2	0	2	5

³ 有關臺灣近50年來教育史學發展、研究與課程，或與大陸教育史研究相較，近來得到相當關注，請參見周恩文（1999，2003，2004a）、劉子菁（2007）。本文限於篇幅，不一一與前述研究結果對比分析，讀者可自行參考比較。

8 教育研究集刊 第 56 輯 第 2 期

表 3 教育史研究主題分析（不含教育史學）（續）

主題 數量 領域	通論	制度與政策	思想與人物	運動與活動	合計
外國教育史	3	2	5	1	11
中外教育史	0	1	1	1	3
合計	9	18	7	7	38

註：本表沿用周恩文（2003）以及劉子菁（2007）對教育史研究主題之分類統計架構。

在外國教育史 11 篇中，以「思想與人物」居多，占 5 篇（45%），可能原因在於國外「制度與政策」一手史料與檔案相對不易取得，相形之下「思想與人物」比較容易切入探究。

另就 38 篇教育史研究主題的時代分布言，表 4 指明中國教育史部分以古代（1840 年以前）14 篇最多，占總數 19 篇的 74%。臺灣教育史則集中在近代（1840～1949 年），共 4 篇，占 5 篇中的 80%。至於外國教育史，則是以近代（文藝復興至十九世紀）7 篇為多，占 11 篇中的 64%。這顯示在研究主題的時代分布上各有集中傾向。

表 4 教育史研究時間範圍分析（不含教育史學）

時代 領域	通史	古代	近代	現代	合計
中國教育史	2	14	3	0	19
臺灣教育史	0	1	4	0	5
外國教育史	0	3	7	1	11
中外教育史	1	0	0	2	3
合計	3	18	14	3	38

註：「研究時間範圍」因中外不同與比較之需，本文延續周恩文（2003）與劉子菁（2007）的統計架構與歷史時段：1. 本國史領域分為通史、古代（1840 年以前）、近代（1840-1949 年）、現代（1949 年之後）。2. 外國教育史領域分為通史、古代（希羅時代）、中世紀、近代（文藝復興至十九世紀）、現代（二十世紀以後）等五大時期。唯《集刊》中有關外國教育史研究部分，並未出現研究中世紀教育史之文章，故未列出「中世紀」時代分類。

三、教育哲學研究部分⁴

若將《集刊》中，教育哲學類論文分為「個別人物及其思想」、「教育哲學理論派別」、「教育本質解析」、「教育研究方法及方法論」與「教育實踐活動洞察」等五大研究領域，首先要觀察這些論文分布領域重點何在，有無偏重？⁵

表 5 顯示，在 179 篇教育哲學類論文中，「個別人物及其思想」有 79 篇為最多，約占 44%，顯示以「人物」來切入，是最普遍的教育哲學研究方式；⁶ 值得注意的是，外國人物占 51 篇，為中國人物（25 篇）兩倍餘，且愈是晚近，愈有重外國、輕中國之現象。「教育哲學理論派別」則以 32 篇居次，比率降至 18%。「教育本質解析」計有 28 篇，比率是 16%。而「教育研究方法及方法論」有 24 篇，雖僅排名第四，但足以單獨成一統計類別，顯示受到相當重視。最後，「教育實踐活動洞察」主要是從教育哲學觀點探討具體教育實務活動，共 16 篇（9%），所占比率最低。

表 5 教育哲學主題分布⁷

主題	個別人物及其思想			教育哲學理論派別			教育本質	研究方法	實踐活動	合計
	中外 比較	中國	外國	通論	中國	外國	解析	及方法論	洞察	
數量	3	25	51	4	9	19	28	24	16	179
合計	79			32			28	24	16	179

⁴ 有關臺灣教育哲學發展、回顧與前瞻，論者亦不少，請參考蘇永明（1999，2000）、但昭偉（無日期）、簡成熙（2005）。

⁵ 有關《集刊》教育哲學研究主題分類，實為難題。《集刊》50 年來之教育哲學研究論文之性質其實相當特殊，本研究曾廣泛參研並考慮使用一般教育哲學常用之分類架構，但是發現不足以含括《集刊》相關文章。故決定依《集刊》實際出現的所有教育哲學文章特性與傾向，做出目前分類。適切與否，仍請方家指正。

⁶ 以本文時間斷限的 2008 年（第 54 輯）三篇教育哲學類論文為例，分別探究 K. Mollenhauer（張淑媚，2008）、G. Vico（吳靖國，2008）與 T. W. Adorno（楊忠斌，2008）等人思想，均屬此類文章。

⁷ 因《集刊》中未出現對「臺灣」教育哲學個別人物或理論派別文章，故表 5 之分類未包含「臺灣」。

10 教育研究集刊 第 56 輯 第 2 期

以上訊息顯示，教育哲學類著重以「個別人物」為主要切入方式，介紹單一「理論學派」比率亦高，兩者合計已逾六成。而「具體教育實踐活動洞察」的研究相對偏少。

另表 6 顯示，在探討中國「個別教育哲學人物」（25 篇）與「教育哲學理論派別」（9 篇）總共 34 篇的部分，時代分布主要偏重在「古代」（33 篇，占 88%）。至於人物或思想派別，則是以儒家（17 篇）為主，旁及於墨家、法家（各 1 篇）；「近代」主題相當少，只有 4 篇，研究對象是張之洞、梁啟超與蔡元培等人。至於「現代」的中國教育史人物思想則未處理；換言之，中國教育哲學研究以古代人物思想，且以儒家人物為主。

表 6 個別教育哲學人物與思想派別時代分布（中國部分）

		古代									近代	現代	合計	
朝代		三代	春秋戰國	秦漢	魏晉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	元	明	清	小計	4	0	34
派別	通論	4	4								8			
	儒		5				7		4	1	17			
	道													
	墨		1								1			
	法		1								1			
其他			2	1							3			
合計		4	11	2	1	0	7	0	4	1	30	4	0	

註：依據表 5，中國部分「個別人物及其思想」有 25 篇，「教育哲學理論派別」有 9 篇，合計 34 篇。本表中未標示數字者為「0」。

至於外國人物與思想派別之時代分布，由表 7 可知，研究主題以「現代」（二十世紀以來）52 篇（68%）最多，「近代」（指文藝復興至十九世紀）14 篇（18%）居次，最後則是「傳統」時期（指文藝復興以前）10 篇（13%）。

在外國「現代」人物與思想派別部分，「進步主義」以 9 篇居冠，顯示二十世紀上半葉影響中國教育學最重要的這股思潮，⁸ 至今在臺灣教育學界仍然受到

⁸ 有關此一教育史實，請參考鄭金洲與瞿葆奎（2002）以及周谷平（1996）。

表 7 人物與思想派別之時代分布（外國部分）

時間範圍	傳統（文藝復興以前）					近代（文藝復興至十九世紀）									
類別	通論	觀念主義	唯實主義	士林哲學	合計	通論	經驗主義	國家主義	自然主義	觀念主義	合計				
個別人物	4	3	2	0	10	1	3	1	1	8	14				
學派整體		0	0	1			0	0	0						
合計	4	3	2	1		1	3	1	1	8					
時間範圍	現代（二十世紀以來）														
類別	通論	進步主義	行為主義學派	文化教育學派	人文主義	詮釋學	存在主義	批判理論	觀念分析學派	後現代思潮	認知心理學派	邏輯實證論	價值哲學	其他	合計
個別人物	1	9	1	3	4	1	3	6	3	5	1	1	1	0	52
學派整體		0	1	2	0	0	1	1	1	3	0	1	0	3	
合計	1	9	2	5	4	1	4	7	4	8	1	2	1	3	
總計	76														

註：依據表 5，外國教育哲學方面「個別人物及其思想」有 51 篇，「教育哲學理論派別」有 19 篇，合計 70 篇。惟少數論文兼及不同派別人物思想，故本表合計總數 76 篇，與表 5 略有差異。

相當重視，持續發揮影響力。其次，則是近年來頗具影響力的「後現代教育思潮」，共有 8 篇。排名第三的則是 1991 年以後逐漸擴增影響力的「批判理論」，計 7 篇。至於臺灣教育哲學界深受影響的「觀念分析學派」則有 4 篇。

至於探討外國「近代」人物思想 14 篇論文中，以源自歐陸的「觀念主義」8 篇居首，顯見歐陸哲學具相當吸引力；其次則是英法的「經驗主義」。最後，在 10 篇外國「古代」人物思想部分，以「古希臘時代的通論」4 篇居首，「柏拉圖學派的觀念主義」3 篇居次。

綜言之，外國人物思想集中在「現代」，以進步主義為最重要。「近代」部分以歐陸觀念主義為重，「傳統」時代則以古希臘思想最具吸引力。

參、相關論文內容分析

以下就歷年《集刊》哲史類論文所反映出，對於臺灣教育學發展過程具關鍵性影響的問題，試做內容分析與詮釋。所選論文以符合本文主旨與關懷，具「指標性」歷史意義者為主，並不必然有「代表性」，亦無法反映所有論文之全貌。⁹ 這些關鍵問題包括：

- 一、當代臺灣教育學與中國近代教育學間有無歷史性承續累積？
- 二、教育哲史類論文有無現實關懷？
- 三、傳統的中國教育文化如何發揚與轉型？
- 四、引進西方學術有無審慎轉化態度？
- 五、方法論上對教育學研究進行哪些自省？
- 六、接受西方學術過程中有無遭遇適應困難？

一、當代臺灣教育學與中國近代教育學間有無歷史性承續累積

如前所述，1958 年創刊的《集刊》，早期是記錄與保存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學生論文的園地，其中亦有當時在研究所任教師長的作品。要回答「當代臺灣教育學與 1949 年之前中國近代教育學之傳承情況」這個問題，可從這些早期任教教師及其著作探究。¹⁰

1955 年，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在田培林主持下成立，當時國共對立，播遷來臺的教育學者人數不多，但多為學界菁英，例如田培林、吳康、黃建中、趙雅博、王文俊等人，都是 1949 年之前中國知識份子中的佼佼者。¹¹

⁹ 在詮釋與評論部分，亦力求嚴謹允正，若有不適當見解，謹請先進不吝批評指正。

¹⁰ 本文僅能初步設身處地考量這些早期學者在動盪時局下的生命經歷及研究環境，著眼他們幾乎孑然一身播遷教育學到臺灣加以延續的史實，就此說明臺灣教育學發展與中國近代教育學的傳承關係。至於詳細學術傳統或文本脈絡分析，留待他日再探。

¹¹ 這些學者背景如下：田培林（1898-1975），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1939 年獲德國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吳康（1897-1976），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法國巴黎大學博士。黃建中（？-1959），北京大學文科畢業，留學英國 4 年，在愛丁堡、劍橋兩大學研究

另一方面，臺灣在日本殖民時代因以師範學校培育小學教員為主，當時臺灣是否有嚴格意義的教育學術研究活動，目前因缺少相關研究，尚難斷定；但考量二次大戰結束、政府遷臺後，「中國化」政策下亟欲去除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所遺種種，1949年之後，臺灣教育學發展極可能還是依賴大陸來臺學者的灌溉耕耘。至於他們傳遞什麼內容給年輕一代學子？本文以為，傳統中國文化哲學與思想，以及他們1930～1940年代在國外習得的西方教育學知識應為兩大主軸。

在傳統中國文化哲學與思想傳承上，特別受黃建中影響。早期《集刊》（約1962年第五輯以前）論文幾乎都以中國傳統人物教育與哲學思想為主，即可窺見此一特徵。¹²可惜，黃建中於1959年過世，此一傳承受到很大影響。

在傳遞西方教育學方面，以吳康（1960）〈道德基本概念——善惡與自由〉一文為例，相當清楚地論述善、惡本義、道德規準、自由意義及其領域，以及自由與道德之關係。該刊中，吳康之其他論文，亦多為純哲學觀念之介紹。另外，趙雅博（1960）發表〈詹姆士的實用主義〉，以引介為主，介紹詹姆士的生平著作、實用主義形上學、實用主義的邏輯、倫理學、實用主義批判等；與其他幾位「老師輩作者」引用文獻常未註明出處的情形不同，該文列有參考書目，堪稱中規中矩。至於趙雅博（1964）發表〈存在主義評價〉，文末開列書目達243筆之多，包括西班牙文、法文、英文、德文與丹麥文。在學術資訊不發達、環境較封閉年代，上述論文傳遞歐西學術知識，對培養臺灣教育研究人才、開啟學術思考視野，有其意義性。

但另一方面，幾位「師長輩學者」的論文也反映時代的限制。例如經常未註明出處，寫作格式並不嚴謹；有時篇幅過少，分量明顯不足。例如吳康（1961）

教育與哲學。趙雅博（1919-），河北省望都縣人，北平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西班牙馬德里大學哲學博士。王文俊（1903-？），北京大學德語系畢業，1937年取得德國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就國內最高學歷言，有四位畢業自北大，一位是北平輔大；就留學國家言，包括德國、法國、英國、西班牙等國，陣容可謂堅強。

¹² 伍振鶯（2008：2）曾說明當時狀況：「早期（臺師大教育學研究所）專任教授黃建中所開的課最多，所指導的論文也最多，黃教授當年所開的課程，除中國哲學史外，先秦諸子與宋明理學各家各派的教育思想，大部分都開過，故而前幾期研究生的題目，遂偏向於中國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

〈孔子教育思想之完全人格——君子、聖人〉，只有短短兩頁；另，〈墨子哲學思想述要〉（吳康，1962）也只有三頁。¹³ 趙雅博（1961）〈西洋近代哲學上的新與舊〉，通篇以譯文為主，除題目外，完全無其他分段標題，全文「一氣呵成」；〈奧古斯定以前的教父思想〉（趙雅博，1962），雖已有分段標題，但未註明資料出處。另從引用資料觀之，吳康（1963：8-10）探討〈希臘民族及其哲學思想之起源〉，最主要的三本參考文獻均係十九世紀出版之英文與法文著作，時間分別是 1871 年、1891 年、1892 年。這顯示當時學術環境不佳，以致研究者參考資料過舊又不足，難以與時俱進。

應該說明的是，這幾位先進雖擁有西方學位與良好學術根柢，但來到臺灣之前，剛歷經八年對日抗戰以及四年國共內戰衝擊；來臺後，又因國家分裂、政治氛圍肅殺、學術環境封閉，研究工作的主客觀條件相當不理想。到了 1960 年代，政經環境逐漸安定後，早錯過厚植學術研究成果的黃金時代，且年事漸高；年輕時於國外所學，此時已與當代西方學術新方向產生落差。但他們堅守學術工作，將傳統中國教育文化的根柢素養，以及在西方直接領受的教育學與哲學訓練，傳遞給新一代學者，為臺灣教育學發展奠定了基礎。1949 年以來，臺灣教育學之建立，這一批大陸來臺學者應有其貢獻，而且也以此承續累積 1949 年之前中國教育學的發展成果。雖然部分人在譯介西方思想時，文字有時不易理解，¹⁴ 或是特定哲學派別思想的影響不彰，¹⁵ 但他們對近代中國教育學術研究命脈在臺灣的

¹³ 值得注意的是，吳康著作等身，影響力相當大，本研究僅就《集刊》所發表者加以討論。

¹⁴ 茲舉一例說明。趙雅博（1961：10）云：「在大陸上，十八世紀的若干哲學家採取了一種枯澀的唯物主義，比如拉買特利：在人乃機器主義者，他便將人形容成為一個複雜物質機械。認為神體靈魂的說法乃是一個小說，在陳述這樣的觀點時，他聲稱笛卡兒是他直接的前輩，我們知道笛氏是開始對宇宙加以機械解釋的；但是他在某一點上也放棄了它，拉買特利呢，他完成了笛氏的主張，認為不但人的生理想程序如此，心理程序也沒有例外，都能夠且應該用機械或唯物假設來說明。」

¹⁵ 舉例言之，趙雅博的士林哲學立場，在往後教育學界並未留下太多的影響。1965 年，他發表〈哲學理論體系的選擇〉大力推崇多瑪斯學派，認為「最能匯合亞里士多德以及柏拉圖之長，且最能久經時代考驗，仍屹立不搖，且肯虛心研究其他不同派別而求得其真，加強真理範圍」（趙雅博，1965：10），然而，這卻是《集刊》50 年來唯一一篇探討士林哲學的文章，遑論多瑪斯學派。

延續與維繫，實具歷史性地位。

二、教育哲史論文有無現實關懷？

一般對教育哲史研究，常有「理論抽象、脫離現實」印象。對此，我們要追問，50年來《集刊》中哲史類論文，究竟有沒有現實關懷？還是閉處象牙塔內，不食人間煙火？

早期，教育研究所學生發表的哲史論文，偶有時代背景的反映、抒發，或批判中國近代新教育。例如，黃振球（1959：98）批判中國近代新教育徹底模仿西方，特重自然科學、現代生活與民主精神，然「推行數十年，為何成效甚鮮？蓋文化、教育之改革唯有漸進實施，如強加外力使其突變，實有方柄圓鑿，扞格不入之弊」；他引述田培林之見，「新式教育辦理到現在，並不曾達到預期效果，『突變』不能說不是內在原因之一」，直言田氏所言「誠非虛語」。

又如伍振鷺（1960a：187）〈孟荀教育思想之比較研究〉，評論孟子「士者，仕也」學以為仕之觀念，

實有悖於教育機會均等之原則。且孟子輕視勞力者，以勞心者可以治人，食於人之主張，亦予後世不良之影響。中國歷來教育與生活脫節，削弱民族生命活力。致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孟子雖為後世所宗，其說非全無可議之處。荀子乃歷代所抑，然其學亦有一日之長。好惡不足以定是非，為學尤不可存門戶之見。

以上都是年輕教育學子在鑽研學問之同時，表現出對時勢、文化的關懷，然有所侷促，沒有鋪陳開展進行深刻論述。真正由衷感受世界分裂與恐怖均衡，強烈體認哲學對人類整體與中國處境之探索有極端重要性的，可以胡秋原 1960 年之〈二十世紀初葉的西洋哲學〉為例。

胡秋原（1960：27-28）擎舉哲學使命，在於：

如果哲學是一種徹底的思索，固必對今日文化分裂問題加以再思索；同時，如果哲學是一種批評的和建設的知識與見解，則他必須幫助一切有思索力的人解除一切科、玄或東、西之成見與虛妄，從而走向一個更完整而有生氣的世界觀、歷史觀和人生觀。

為何會這樣主張？據胡秋原之見，東西文化發展不平衡，本即近代史上影響人類生活最重大之事。在中國方面，更因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科學與玄學之爭傳到中國，與中西之爭合流，且同時面對科玄之爭與中西之爭，所以問題根源與性質極為複雜，更難解決。為解決人類整體與中國處境問題，胡秋原從當代學術和實際問題之發展，看當代西洋人精神狀態有何新成就，進而反思理論上以及對迫切問題之解決上不足之處何在，藉以找到新努力之必要及努力方向何在（胡秋原，1960：27-28）。作者批判犀利，問題意識清楚，企圖心與格局均強，架構亦非常獨特，且反映出哲學思索與大時代關鍵問題之間極密切的關係，顯示強烈的現實關懷。

以上列舉，意在說明早期論文具有強烈現實關懷精神，這當然是國家民族巨變與悲劇中，悲切沉鬱心情的反映。這種現實關懷精神，是否一直延續於《集刊》之中？以下將舉影響臺灣教育哲學界相當深遠的「分析哲學」為例，予以探討。

分析哲學的論著第一次出現在《集刊》是 1976 年，高廣孚〈論分析哲學對教育的影響〉，以及同一輯中歐陽教〈認知結構與教學的關係〉兩篇論文。高廣孚介紹分析哲學的發展歷史、理論特性、對教育哲學，以及對知識教學的影響；歐陽教則實際嘗試將分析哲學運用於「教學」問題探究。兩篇頗有互相參照發明之勢，並開啟《集刊》以及臺灣教育學史上研究教育分析哲學的風潮。

值得注意的是，歐陽教的撰文重點並非只是介紹教育分析哲學，而是從認知論角度分析「教學」議題，側重認知結構與教學種種關係的分析解釋，目的在辨明究竟哪些該教，哪些不該教？哪些方式合於或悖於認知意義？應採何種方式來教，較為合理？藉以理出原則與評準，供實際教學活動參考（歐陽教，1976）。該論文顯示，分析哲學有助對「教學」觀念分析與釐清，所以是一種了解教育本質與活動之意義極其有效的途徑。

之後，歐陽教繼續採哲學分析與批判方法，發表〈宗教信仰的德育與反德育涵義〉（1980）、〈宗教與教育的關係〉（1992），也屬具有現實關懷的分析哲學應用之作。兩篇論文融合中西道德哲學、心理學、宗教研究成果，以及對實務的敏銳觀察。歐陽教（1990）亦曾以〈教育的概念、口號及隱喻〉為題，運用觀念分析方法，評析並嘗試界定「教育」定義，他示範分析教育和反教育的具體引例，又舉例詮釋教育之合價值性、合認知性，以及合自願性規準。

類此論文，均是應用教育分析哲學於實際教育活動諸層面。引介理論與觀念固然重要，述明與示範日常教育踐履中應如何「操兵演練」，實更有啟發性；像這樣生活化的運用與舉例，將理論轉化到教育日常生活世界而是是非非，相當程度增進了對教育本質之理解，頗能彰顯教育分析哲學的重大價值。

除了這幾篇教育分析哲學的論文之外，1990年代《集刊》還有多篇論文，強烈展現作者對於實際教育與文化問題的深刻感受，並進而提出解決之道，以下試說明之：

1995年，時值解嚴後臺灣邁向多元文化社會的「學習摸索」期，楊深坑發表〈後傳統認同與文化多元主義〉。該文引用 J. Habermas 溝通行動理論之概念架構，探討多元文化下，合宜個人認同與族群認同之可能，並指陳臺灣未來教育規劃需建立在 Habermas 所言的成熟政治文化上，才能使教育幫助全體國民度過價值混淆所可能帶來的認同危機（楊深坑，1995）。同年，溫明麗發表〈台灣之現代化：乏自主性自律之教育〉，她說明撰文之際正逢社會激變，因此試圖反省臺灣教育發展瓶頸。溫明麗由教育觀點反思阻礙臺灣現代化的關鍵因素，接著提陳「批判性思考能力」之培養，為促進臺灣邁向現代化之道。溫明麗（1997）再發表〈批判性思考即為通識教育〉，強烈主張通識教育內容可能因時空、人事之變化而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精神仍是人文性，而批判性思考又為其核心，因此論證批判性思考是一種通識教育。

以上所舉 1960～1990 年代諸論文，均說明教育哲學論文並不完全是學者的幻構，這些論文背後多有獨特而深具時代性的現實關懷。1960 年代早期之論文如此，在二十世紀末邁向多元化「後現代社會」時，亦復如是。

三、傳統的中國教育文化如何發揚與轉型？

如果上述歐陽教多篇運用分析哲學方法於教育相關概念之處理，較接近於「將西方理論做為銳利解析工具，剖析我國社會文化脈絡下的教育所應具有之本質」，這樣的研究取徑提供非常實際的貢獻。此處則要繼續追問，是否也有學者以我國傳統學術文化思想為基底，探討「我們」的教育本質、教育哲學、教育史等。檢視《集刊》論文，即使 1950～1960 年代研究中國教育哲學人物的「鼎盛期」，這種取徑亦少見。以下將分為：（一）中國傳統教育思想基礎之整理、（二）

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美育觀研究，以及（三）中國教育史等三方面，加以觀察。

（一）中國傳統教育思想基礎之整理

50 年來，《集刊》唯一一位長期有系統地整理中國傳統經典，且以對西方文化的了解與思考來回答教育本質等基本議題的，是賈馥茗（1926-2008）。賈馥茗（1972：23-24）發表〈教育的適應性及不變性〉，探討教育研究應追求永恆不變的價值，抑或時時適應環境變化，加以迅速調整？她強調兩者統合的重要性。賈馥茗比較中西教育發展中的適應性與不變性，認為中國自漢代的儒家思想定於一尊，教育以發展人性、培養人格為主，以不變為重；西方以探索自然、改善生活為主，側重適應；中國注重教育不變性而形成精神文化發展，西方注重教育適應性而形成物質文明進步。然中國人性與人格不變部分，卻因科舉倡行後，以學而優則仕為目的，趨於利祿，形成偏差，不但物質有所缺失，精神文化發展亦未遵從應有方向；至於西方物質文明進步，缺少精神基礎，終致物質文明發展極盛時，精神無所憑依，而輾轉失據。今日世界秩序難以維持，中西人心忪惶不安，多由於中西兩方在教育適應性與不變性上未做適當統合，未遵循正確途徑所致。該文於中西文化的評論態度持平，不卑不亢，對各自的優缺點有相當深切的觀察與體會。

賈馥茗（1977：8）發表〈從「學」「庸」中所見的教育「準則」和「情懷」〉，得出教育真義是培養「愛」的情操，認為這是〈中庸〉所謂「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師應本愛的情操教人，學生則學習培養愛的情操，然後再本著仁，去愛人愛物。進一步言，教育的準則是「誠」，教育的情懷是「仁」，前者是天道的準則，後者是天地的情懷。天地期望人明白、奉行這準則，且從而擴大之；同時也期望人具備、表現這情懷與情操，先把它作用在人和人間，再擴大到宇宙萬物，以實現天和人共同期望的「和諧雍穆」、萬物各得其所的「太平盛世」。

賈馥茗自 1985～1994 年連續發表多篇論文，探討東周以前中國教育（1985）、中國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1986，1987，1988），以及東周教育和學術思想（1989，1990，1991，1992，1994）。這些論文有系統地回到中國教育之源流，探討教育目的、內容、制度實際、教師與教學方法等，以見我國文化發展和進步的形跡。

賈氏對於傳統經典之整理、對教育準則和情懷的闡述，描繪出極具特色的教

育文化理想，較之西方教育文化理想的探索（例如早期在臺師大教研所備予推崇的德國文化教育學），其實毫不遜色。然而，賈馥茗的論述大多係自己研讀與詮釋原典，甚少引述當代臺港等地蓬勃發展的中國哲學界研究成果，或與之互相發明，且在《集刊》中類似取徑的努力與投注者極其有限，因而顯得「單打獨鬥」，但她努力闡述傳統經典中教育文化思想，還是開了一個很好的頭。

（二）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美育觀研究

美育是《集刊》50年來相當重要的主題，¹⁶早期論文多上承蔡元培的美育觀，且批評多於贊同。王文俊（1978）首先在《集刊》對於蔡元培「世界觀教育」與「美感教育」提出批判，他認為「兩個世界」¹⁷之說法固自成體系，但懸鵠太高，致曲高和寡，在當時能徹底了解的人不多。所以，王文俊對蔡元培美育及世界觀思想持保留態度。

李雄揮（1980）〈蔡元培美感教育思想研究〉對蔡氏思想有肯定，也有批判與修正。李氏認為，蔡元培有自己一套思想，惜未做進一步發展，以致系統粗略，又誤解其他哲學家，二分法及世界觀教育不僅與中華文化不相合，亦不合當時的時代需求。所以李氏以「理想人格教育」（此指學為聖人）來代表「道德教育」主要意涵，同時修改蔡元培「美感教育」所要完成的應是「道德教育」，而非「世界觀教育」。就碩士論文言，該文算是企圖心與眼界頗高的作品。

以上對於近代中國教育學建立以來美育觀點的繼承與批判，表現出此學術課題具延續、積累特質。崔光宙（1988）〈樂記篇源出考及美育觀〉，試圖融會東西方美學與美育觀。該文首先依 J. Schiller 〈美育書簡〉，尋出美育字源意義，其次依史料與記載先秦美學思想的《禮記·樂記篇》之行文特徵，求證其出處，以為詮釋依據；最後據考證結果，彰顯其美育觀，對美育概念提出澄清，並由東西美育思想之融通，鋪陳相互發明之效。崔氏此文甚具創見地悠遊融會東西文化。

崔光宙（1999）又發表〈孔門情意教育觀之詮釋與實踐〉，以《論語》和《禮記》為素材，詮釋學為方法，探討孔門「興於詩，游於藝，依於仁，成於樂」之

¹⁶ 除本文探究的諸文之外，尚有楊深坑（1980）、林逢祺（1998a, 1998b）、李崗（2006）等，時間分布亦相當綿長。

¹⁷ 此指蔡元培依據 Plato 與 I. Kant，將世界分為「觀念界」與「現象界」，而欲以美感教育融會交流之說。

情意教育觀，亦即化負面情緒為正面情緒、人文素養的陶冶與充實、理性與感性的平衡，以及圓滿自足的人生觀，從而歸納情意教育的四大目標應包括健康、豐富、均衡與圓熟；最後以詩樂欣賞為例，論述孔門情意教育實踐，以及對現今師資培育之啟示。

崔光宙 1988 年的論文是以傳統中國文化經典為主軸，輔以西方美學理論，至 1999 年之作，則純然回到中國儒家傳統，探討廣義美育（情意教育）。該文彰顯孔門情意教育觀既豐富且完整，境界極高，似可不必再窮索套用西方理論。

（三）中國教育史研究

歷年《集刊》有關中國教育史研究論文數量甚少。早期，伍振鶯〈唐國子監隸六學考〉（1960b）、〈宋太學三舍法〉（1962）等，均引用一手史料處理重要的教育史議題。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集刊》都沒有類似研究出現。直至 1986 年，周愚文發表〈北宋的三次教育改革〉，才又再度出現中國教育史研究論文，相隔已二十餘年。鑑於北宋三次教育改革在中國傳統學校教育發展上的重要性，以及過往史家研究宋代多側重私人書院與理學，忽略官學發展，該文透過對三次教改的背景、原因、構想及實際措施分析後，試圖勾勒北宋教育制度的全貌、影響三次教改的成敗因素、對南宋的影響，及其在教育史上的重要性。

周愚文（1995）發表〈宋代的小學教育〉，則屬注重兒童、婦女等取向的新史學研究。此一研究對於向來受忽視的傳統小學教育之深入認識，有相當貢獻。周愚文（1997）另發表〈敦煌寫本《太公家教》初探——校勘與分析〉，亦是延續新史學取向，校勘分析《太公家教》此一晚唐以降民間通行的啟蒙教材。這種校勘史料的基本研究，耗費極多心力，需要無比耐心與細心，才能有所得，但這卻是發掘確當教育史實、史識，闡釋其教育意義的根本工作。

受到 1990 年代本土化教育思潮影響，《集刊》也於 1990 年代末期，開始出現以臺灣教育史為主題的研究。如單文經（1998）〈一八九五年以前鹿港教育史初探〉、單文經（1999）〈日據時代鹿港地區的教育活動〉，彭煥勝與吳正龍（2003）〈清代彰化縣儒學的建置與組織〉、彭煥勝與吳正龍（2005）〈清代彰化縣儒學的生員教育〉、張耀宗（2005）〈本土化 vs. 荷蘭化——荷蘭時期臺灣教會的語言使用〉等文，發表時間相當密集，都屬於這一波臺灣教育史研究風潮下的研究成果，對各個時期臺灣教育史實的了解，提供初步的研究成果，未來若

能有更全面而系統的研究投入，將會更加可觀。

以上觀察「傳統中國教育文化傳統如何發揚與轉型」，結果發現，傳統教育思想基礎已有初步整理，且有很好的詮釋觀點與成果，但仍待更多新血投入；另應多與相關領域，如中國哲學、中國史學，研究成果交流借鏡。在美育思想部分，出現藉由西方美學理論，發揚傳統美育與情意教育思想的研究，且能與近代以來美育思想進行繼承與修正的對話性研究，可惜的是，這些令人驚豔的「傳統發揚與轉型」作品數量偏少，亦缺乏持續與累積。至於教育史研究，除制度研究外，亦出現以庶民、兒童、婦女立場，強調各種材料都可以利用作為史料的新史學觀點下的作品，臺灣教育史課題逐漸受到重視，中國近代教育學發展史之關鍵問題亦略有探討，¹⁸顯示諸多重要研究問題已初步開發，值得深入探究。

四、引進西方學術有無審慎轉化態度？

就知識轉移理論觀點，幾乎任何模仿或移植外國的教育制度與理論均難有純然複製移植，必定會發生「轉化」（Schriewer, 1999; Steiner-Khamsi, 2002）。在此，我們要找出《集刊》中，西方理論是否以及如何「轉化」，並說明它的歷史特性。以下試就 50 年來，影響臺灣教育學較為重要的兩類西方教育學理論：（一）文化教育學說、（二）J. Dewey 教育學說，以及（三）其他有關外國教育史與教育理論的研究，說明其在我國「知識轉化」的特性。

（一）文化教育學說

文化教育學派是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早期的教學研究重點之一，主要當然是因為田培林與王文俊兩位留德學者的關係。創所所長田培林辦學強調「教育學乃是哲學」以及「教育即是文化」，其實正是 1920 年代起直到田氏 1930 年代留學時，德國大學教育學之主流與傳統。這種教育學研究典範與中國自 1922 年新學制以來，遵從美國實用主義教育研究典範的風潮大異其趣。而王文俊則主要是透過教學與著述，闡釋文化教育學派理論，例如 1978 年他以 E. Spranger 之觀點，探討〈今日我國大學的使命〉。

王氏此文以為今日大學之病，乃是「預測科學」（按，應指自然科學）把原

¹⁸ 例如吳美瑤（2005）、劉蔚之（2007，2008），均探究 1949 年之前中國教育學之建立與其文化發展方向問題。

先做為「生活引導的科學」完全抹煞，且歐美、中國皆然。但在中國，五四運動所提兩大口號——「民主」與「科學」，原本沒有什麼不對，卻缺少重要的「倫理」，顯然失掉了民族文化核心。王文俊認為，今日大學之任務有研究、專門教育、人文教育三者，前兩者雖有缺失，仍有改正補救的可能，所以，問題重心不在這兩者，而在人文教育，即 Spranger 所稱的「生活指引」上，這是建立大學生正確宇宙觀或世界觀的關鍵，唯有以價值哲學，尤其是倫理學為基礎建立的世界觀，才是正確恆久的世界觀（王文俊，1978：45-50）。

王文俊此文顯示，真正該關心的是中國與臺灣在教育與文化的困境與解決，文化教育學派的觀點是啟發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媒介，所以論文標題與內容均以中國與臺灣的大學教育為主，而以文化教育學派的理論思想之闡述為輔。這是將所學習與接受的外來理論，在本國情境下加以修正與實踐，使之因應本國社會文化氛圍、學者個人或時代共同的問題意識，以及對自身教育與文化問題的詮釋方式。王文俊（1975，1977）對文化教育學派的掌握與闡述，能充分掌握精義，所談諸觀念雖有玄遠處，但其實都是極為動人的篇章。

1937～1944 年間，王文俊曾依大教育家 J. H. Pestalozzi、其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Spranger，以及中國教育家蔡元培的教育理想與施教原則，佐以自己赴德深造前在國內從事中等教育的經驗，於青海省創辦並主持湟川中學，王文俊（1981）曾完整地在《集刊》撰述〈青海興學記——創辦青海湟川中學經驗談〉一文，提供我們理解德國教育學在中國之接受與實踐唯一一篇較為完整的文獻。這種結合本國與外國教育思想家的理論，並將之實踐的知識轉移，其實已經到了「內化」境界。王氏抗戰期間在青海之辦學，以及在臺灣傳播文化教育學思想之努力，深具歷史意義。

（二）Dewey 教育學說

《集刊》在人物與思想探究方面，討論進步主義教育的論文共有 9 篇，數量相對是最多的，顯見 Dewey 的影響從 1920 年代的中國大陸到今天的臺灣，一直持續不減。在《集刊》討論 Dewey 的論文中，對於 Dewey 教育思想的接受，具有哪些轉化特性？首先以早期論文觀之。程祿基（1960）發表〈杜威教育思想研究〉，全面探討 Dewey 整體教育思想，架構相當大，並未專注在具體問題上深入討論。此文大量譯述原文，在引用相關資料部分，包括 1949 年之前即具國際

知名度的 Dewey 學者吳俊升的作品，顯示程基祿這篇論文確有上接 1949 年之前中國 Dewey 研究成果之勢。程基祿較特出之處，在於花了很大篇幅整理實在論與理想主義兩方面批判 Dewey 的見解，而作者自身的反省也有現實意義。

程祿基認為 Dewey 因過度強調工具主義，以致不能使其思想深入於建設之效果中。科學固甚為發達，人類道德能力卻與數千年前幾無二致，以此觀之，Dewey 學說「不能不使人疑慮橫生也」。所以，程祿基（1960：254-258）指出：

余讀杜威書，深覺其推翻傳統之頑固思想，提倡進步、民主與科學之社會，不失為一種啟迪與鼓舞之力量，但其偏激之處，頗有使智者愈智，而愚者愈愚之感。

尤有甚者，

方今國難方殷，赤焰又至，既大敵之當前，則當以一切智慧歸於知識與紀律，是對杜威之說，亦不能（不）做審慎之考慮與運用也。

此類批判反思之意見，很能顯示當時大陸赤化，國家分裂下時代的警醒意識。雖然議論性質較強，不是嚴謹推理論證，卻表現出對盲目接受 Dewey 學說之疑慮，有其歷史意義。

至 2000 年《集刊》納入 TSSCI 後，有關 Dewey 論文在研究主題、切入方式與形式風格上均有相當轉變。林秀珍（2001）採修辭學與邏輯解析方法，探討 Dewey「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的可能涵義，並從經驗的連結與統整、民主生活的體現，對「教育即生活」加以探討，提供教育工作者「生活中心」的理念涵義與具體實踐策略。林秀珍（2003）又對 Dewey 教育目的論再做澄清，另藉由老莊哲學的超越觀點，開顯「生長」的人文義蘊，以深化 Dewey 教育目的論的內在精義。江合建（2001）則認為，長久以來，國人對 Dewey 思想一直圍繞在實用主義、實驗主義或工具主義的視野，因此轉而探討 1934 年「藝術即經驗」之意涵，與 Dewey 推廣的各種具體活動，並提出總結與批評。至於林逢祺（2003），重新詮釋 Dewey 思想方法論在教學原理的意涵，說明 Dewey 反省思維的重要性，繼之，以主動性、目標性、完整性與繼續性做為理想教學的核心，並對思維術的方法論提出批判性的反省，指出以科學方法為典範的反省思維，並

非 Dewey 心中唯一有價值的思維，必須輔以經驗方法及人文思維，方能觀照生命全貌。另，晚進陳閔祥與洪仁進（2007），則是從 Dewey 思想衍繹教師角色與教學的美感特質。

相對於 1960 年程祿基的論文，近期探討 Dewey 論文的純學術研究性質愈強，不做太多抒發與推論，只進行學術社群專業而理性的對話，這是追求嚴謹規範下一種不得不然的學術特性，也是時代較為安定、學術環境趨於成熟的條件下，較有可能出現的作品形式。¹⁹

（三）其他外國教育史與教育理論研究

首先是教育史部分。外國教育史領域論文 50 年間有 11 篇，數量偏少，其中重要關鍵之一應是國內能提供的支持性研究環境不足，缺乏可資運用的一手史料，此為先天條件上的弱勢。早期學者只能引用不夠新的間接資料，且常遭遇語言之間層層遞轉的隔閡問題。而黃光雄（1978，1986）撰寫英國關切貧民教育的教育家 J. Lancaster 在美洲期間的導生學校運動、A. Bell 的生活與著作，時間較為晚近，已能以一手史料為主、間接史料為輔，相當難能可貴。

不過，外國教育史研究有其累積與進步，亦是有目共睹。特別是林玉體發表的系列論文，例如〈斯巴達及雅典的教育〉（1976）以及〈教育理論孕育期——希臘時期〉（1991）二文，對這影響世界發展至深且鉅的古典教育時期，進行深層探析、比較與批判，使國人得以更加了解希臘教育實況。作者在前一篇中之主要參考資料是西洋教育史的英文經典著作，如 P. Monroe、W. Boyd、G. Compayré，以及 E. P. Cubberley 等人的作品，並未包括希臘原文或譯文等一手史料；15 年後，第二篇參考資料來源已相當多元，包含 Plato 與 Aristotle 的英譯本，及多本探討希臘歷史、教育與哲學的英文專書。雖然兩篇論文都沒有明確的待答

¹⁹2000 年《集刊》納入國科會 TSSCI 資料庫之中。自此刻起，投稿數量更多，獲得錄取刊登之文章學術嚴謹性更強，確為一時之選；但純粹西方學術延伸的方向似乎亦愈明顯。在外國教育哲學部分，後現代主義（如 M. Foucault、J.-F. Lyotard）、傾向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學（如 Ch. de Pizan、N. Noddings）、老人教育哲學、批判理論（如 W. Klafki、T. W. Adorno、H.-G. Gadamer）、批判教育學（如 P. Freire）等多元化理論思想，獲得引介與應用，頗有百家爭鳴之勢。然而，對於已經成為經典人物的 Dewey、J. F. Herbart 或 Kant 等，亦仍不斷有新研究產生。

問題與索解問題的方法步驟，格式上比較傾向引介寫法，但考量外國教育史研究所常面對的語言及資料取得困難問題，以及林氏在《集刊》中其他作品均文字典雅、清楚易讀，且不時包含義理褒貶，又能適時對照臺灣教育現況加以說明的特色，兩篇論文實為吸收消化過的作品，對於西洋教育史的引入、介紹與傳播，已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

總體而言，對於西方教育學術的引進，早期論文對於文化教育學派或 Dewey 教育學說，具有較多的「轉化」嘗試與成果，甚至表現得較為灑脫或激昂，晚近則愈來愈強調學術研究的嚴謹格式與論證，這雖顯示出臺灣的教育學研究的確在 50 年間累積出相當成果，但似乎愈來愈缺少「文化上的轉化」努力，以及與傳統文化「接榫」的企圖。至於偏少的外國教育史研究，受限於客觀條件，則主要停留在引介認識層次，「轉化」現象尚不明顯。²⁰

其次，學者究竟在從事教育理論的「比較研究」時，有無意識到比較性研究應具有的審慎態度？茲舉下列論文為分析對象。楊深坑（1982）曾從 Plato 美育思想，探討我國應如何在自身的獨特情境脈絡下從事文化建設。他強調美育的實施需植根在民族文化基礎上，揭櫫高遠理想，方能透過美育促進民族文化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非企圖將 Plato 美育思想內涵照搬到我國，而是考察 Plato 在希臘古典精神出現空前未有危機時，如何提出高遠而又切近的文化理想，以做為我國解決自身問題的參考。在〈西德師資培育制度之歷史回顧與展望〉（楊深坑，1989）中，作者探討德國師資培育制度如何凝聚哲學智慧與現實需求逐漸發展而成，他透過詮釋學行動的深入理解，將形於法令規章之教育現制做為待詮釋的文本，嘗試追索其影響史，再以我國現在的歷史脈絡為主體，做一視野交融，開展適合我國師範教育改革的建議。

另以蘇永明（1996）〈郭爾堡的道德認知發展論評析〉為例，此文係由「後現代主義哲學」角度，亦即多元文化觀點，指出在臺灣廣為介紹和採用的 Kohlberg 理論無法成立的理據。作者否認 Kohlberg 所謂客觀普遍的道德階層之說，認為是 Kohlberg 自己建造起來的邏輯建構物；Kohlberg 且持守我族中心主義，以西方近代才發展出來的權利觀念和社會組成的契約論，做為具有普世性的道德

²⁰ 外國教育史與外國教育哲學研究有無「轉化」的可能與必要，限於篇幅，此處暫不論述。

認知發展第五、六階段。蘇永明認為，Kohlberg 根據 Kant 學說來建構其道德認知論，但 Kant 理論只是諸多道德哲學之一，Kohlberg 卻獨以之建構全面性的大型理論，以致破綻連連。因此，蘇氏強調在借用這個理論之前，吾人應有深入了解，不可盲目接受。該文對於廣為肯定與習於接受的心理學理論所提出的質疑，非常有力。它顯示對於西方「名家」理論，是可以經由其他不同理論典範進行反省性批判的，換個角度將會有完全不一樣的內涵，不應不加思索地全盤接受。

以上幾篇論文顯示，雖然《集刊》中多數引介西方哲學與教育理論的論文並未處理此一問題，但是，的確有極少數作者特別為文探討。他們可能不是多數，卻深具指標意義。

五、方法論上對教育學研究進行哪些自省？

方法論是《集刊》重要論題之一，它對於國內教育學研究的深度反思與嚴謹度提升，有關鍵影響。最早提出的賈馥茗（1970），解釋教育學方法論與教育研究法之間的差別，強調教育學方法論是基於教育學這門「學問」的方法與技術，著重理論指引。賈馥茗此文對教育學的研究目的、性質與範圍、研究途徑等，均有相當原創而獨到的解說。背後的企圖與格局，亦稱宏大。

1980 年代初期，續有兩篇碩士論文處理教育學方法論的課題。崔光宙（1981）〈建構類型及其在教育理論發展上的意義〉一文，嘗試將社會科學方法論運用於教育研究領域，以促進教育理論的發展。徐光台（1983）〈邏輯經驗論的價值論及其在教育上的意義〉則特別針對實證方法是否為獲取教育知識唯一合宜方法？實證教育研究是否得當？實證方法和其他研究方法是否可以並用於教育研究，以把握教育現象的不同層面？等問題加以回答。兩篇論文均把握到教育活動是具有價值意向性與技術性的活動，僅運用實證方法並不足以探究整體教育現象，必須配合其他方法對教育的不同層面進行研究，才能整體掌握，所以實證方法和其他方法是可相容的。若對照 1920～1930 年代，大陸時期教育學方法與學科性質上之自然科學化要求，這兩篇論文的方法論反省已頗有進境。

楊深坑曾於 1984～1988 年於《集刊》發表一系列有關教育學研究方法論的論文：〈教育學方法論的規範性與描述性〉（1984）、〈教育理論實踐的關係〉（1985）、〈教育學科學性之詮釋學分析〉（1986）、〈教育學經驗科學化之歷

史評述及其後設理論分析〉（1987）、〈意識型態批判與教育學研究〉（1988），這一系列論文的問題意識更為清晰，站在後設理論的基點，陸續探討教育學研究的基本性質，以及各種研究典範的歷史演進、特長與限制。楊氏探討的方法論議題非常豐富，在此不及一一列舉，他從各種面向探究教育學方法論，增進學界對於教育學學科特性、研究的嚴謹性及反思性之深入理解，貢獻卓著。

在教育史研究部分，方法論相關研究的出現更晚。林仁傑（2006）〈解釋過去、了解現在、預測未來——論歷史研究的典範轉移及其對教育史研究的啟示〉，針對〈教育史研究方法上的四個概念性問題〉（周愚文，2004b）一文繼續深究，有同意，也有質疑；另藉由西方史學的發展與典範轉移、分析史學與敘事史學的不同主張與信念，提出對教育史研究的啟示。林仁傑認為，臺灣傳統教育史著作偏向以敘事史學方式撰寫，今後可嘗試從分析史學角度出發，藉由運用「社會科學」概念方法進行研究，進而開創新局。

林仁傑以博士研究生的身分，對自己老師的相關論述提出贊同與質疑，這種師生之間的對話互動，對於學術的切磋與進步有正面的意義，相當令人驚喜。期待未來在《集刊》中，能有更多對於同行學者、前輩師長論述的真誠討論與互動對話，如此，將帶動研究社群精彩可期的進步。

周愚文（2007）〈輝格史觀與教育史解釋〉亦是《集刊》中少見關於教育史研究方法論的論文。作者檢討歷史解釋中，「輝格史觀」的進步史觀與以今論古觀兩種涵義，及其在國外教育史研究上曾出現的缺失；同時，又透過作者個人近年諸項研究案等經驗的分析，重新反省其得失，提出日後研究上的運用限度。這對於教育史研究進行歷史解釋時的周延妥適，提供很好的提醒作用。

以上探討 50 年來對教育學研究本身曾進行的自省，顯示的確有不少探討與結果的累積。對照《集刊》早期與近年來所發表各領域或不同研究方法之論文，的確愈為嚴謹，且不同研究典範對各自研究方法的注重與反省，實有相當程度的進步。

六、接受西方學術過程中有無遭遇適應困難？

所謂適應困難，可分為內容與形式兩方面。其中在內容上，比較大的困難可能在於「傳統學術轉型」與「西方學術延伸」幾乎呈現兩條無交集軌道的趨勢。

教育學某些領域似乎毫無條件地延伸西方學術於臺灣，且視為理所當然，完全沒有所謂適應困難可言。而以中國傳統教育思想與歷史為對象的研究，人力資源與研究數量均顯不足，相當孤單。有關內容上的適應問題，將在下節繼續探討，在此先以形式上最具體可見的論文編排格式之適應問題為例，說明其困難。

《集刊》在創刊初期，因為以教育哲史，特別是中國哲史領域為主，在版面編排上一直使用傳統中文書籍由上而下直寫，且由右頁往左頁閱讀的方式。但是，學科逐漸分化，原有編排方式已經顯得不能符合新興次學科領域需求。圖 1 是以第 12 輯（1970 年）為例，說明當時常見的西文參考書目排版方式，閱讀時需將整本書橫著閱讀，而同樣一篇論文的英文摘要，在圖 2 中卻因應一般英文閱讀習慣，改為橫式編排。圖 3 則顯示，同樣是第 12 輯，其他論文卻出現直式編印的英文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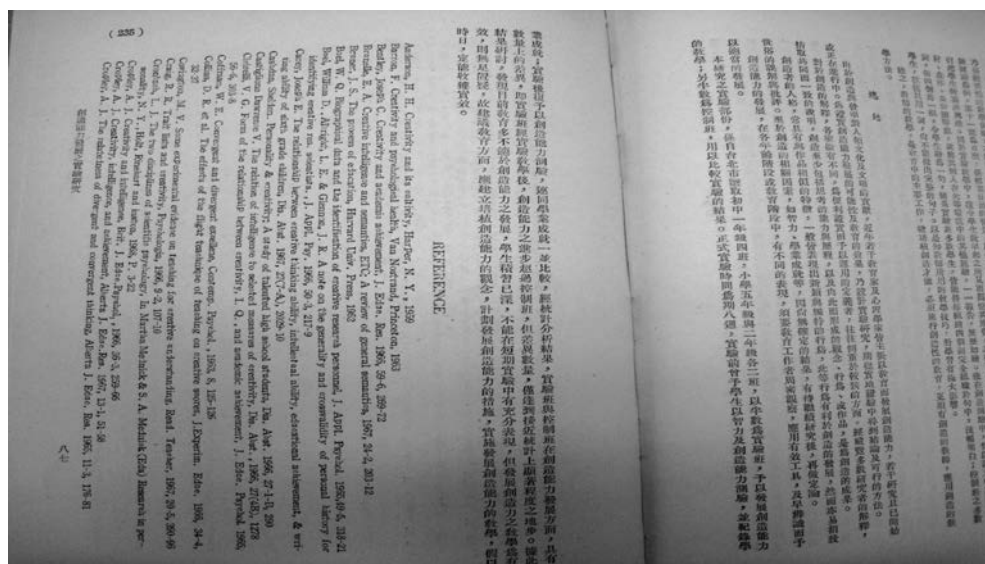


圖 1 西文參考書目排版方式，閱讀時需將整本書橫著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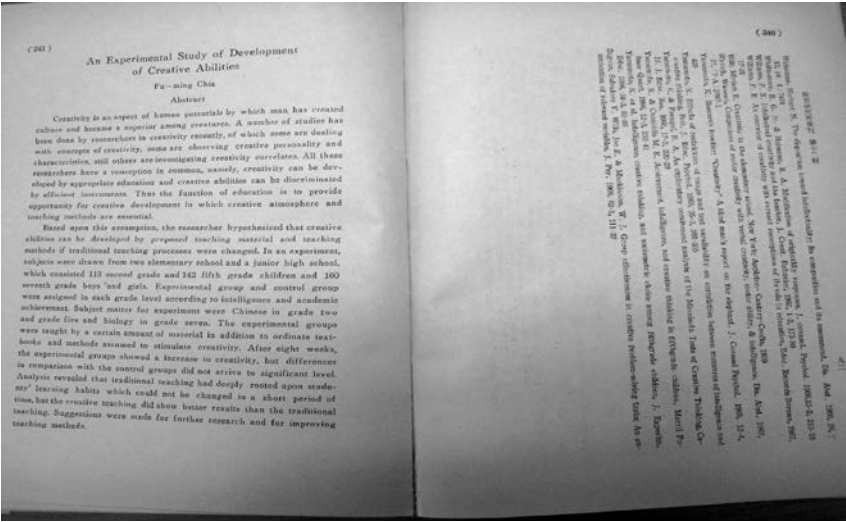


圖 2 與圖 1 同一篇論文，英文摘要卻改為橫式編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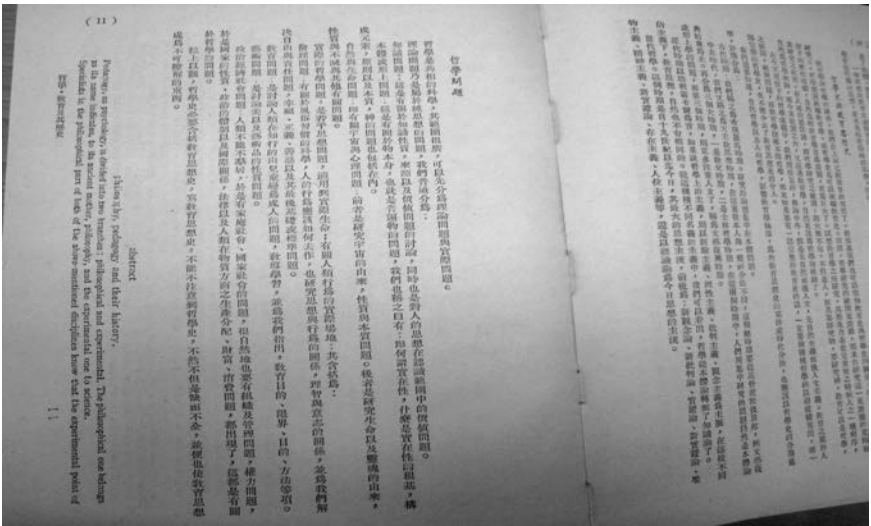


圖 3 同樣一輯，另一篇論文卻有直印的英文摘要

自第13輯（1971年）起，可能是因應學術分化及國際學術期刊習慣，一般教

30 教育研究集刊 第 56 輯 第 2 期

育史哲論文雖仍一如既往，以中文直寫，由右頁至左頁閱讀，但圖4、5顯示，前半部論文正文是由上至下閱讀，先右頁再左頁，緊鄰每一篇論文之後的英文摘要，卻是橫式編排，且仍「由右頁往左頁」閱讀，完全違反西文閱讀習慣。至於後半部量化研究，則開始以中文橫排，置於《集刊》的後面，並由書的「最後」開始，往中間翻閱，形成一本書前半部直排而後半部橫排，且由前、後均可開始閱讀，兩大部分不相整合的狀況。頁碼系統也分別編為前後兩套，增加引用的困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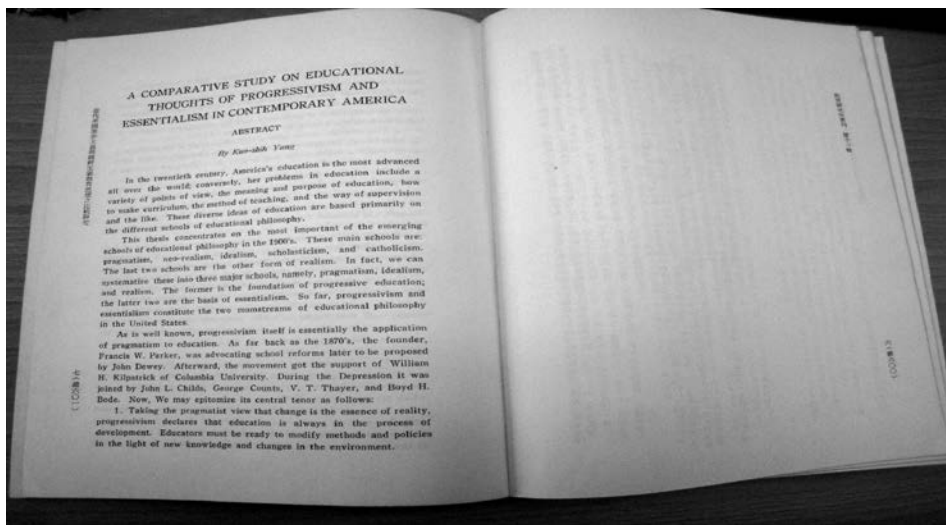


圖 4 集刊前半部，右半頁隱約見到的正文是由上至下閱讀，左半頁則是橫式編排的英文摘要

這種不整合情況一直延續相當久，而且「後半部」份量愈來愈多，第 13 輯（1971 年）開始時只占 78 頁／681 頁（11%），第 15 輯（1973 年）占 534 頁／891 頁（60%），已達 6 成。直到第 33 輯（1991 年）大改版前夕，仍占 87 頁／364 頁（24%）。《集刊》分為前後兩不統合部分的時間，總共長達 20 年之久。圖 6 與圖 7 透露整個 1980 年代的編排格式，仍是突兀而混亂。

這種編排格式上的混亂情形，一直要等到 1992 年（第 34 輯），距《集刊》首度發行已經 34 個年頭之後才獲得統一，成為今天所習見的《集刊》，整本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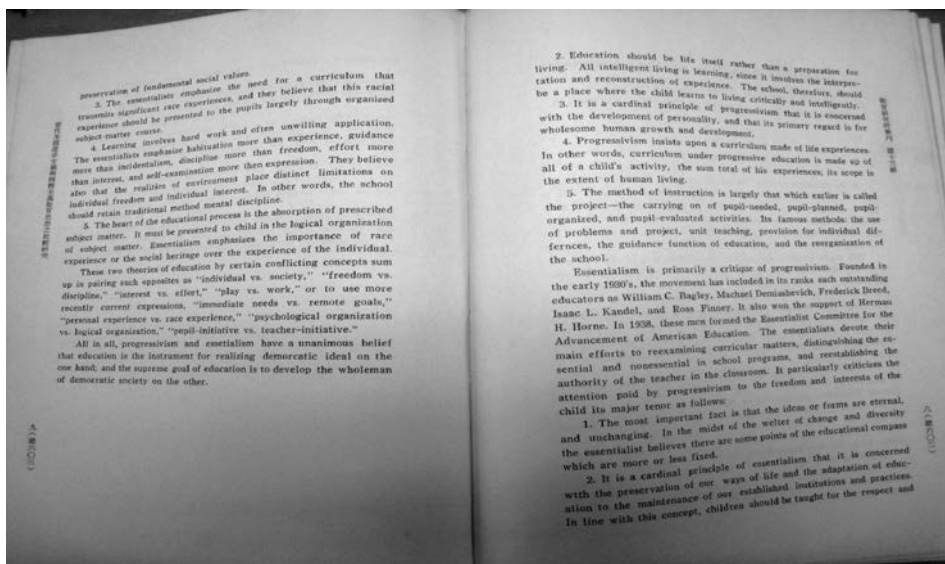


圖 5 與圖 4 同一篇英文摘要的第二與第三頁，先閱讀右頁，再閱讀左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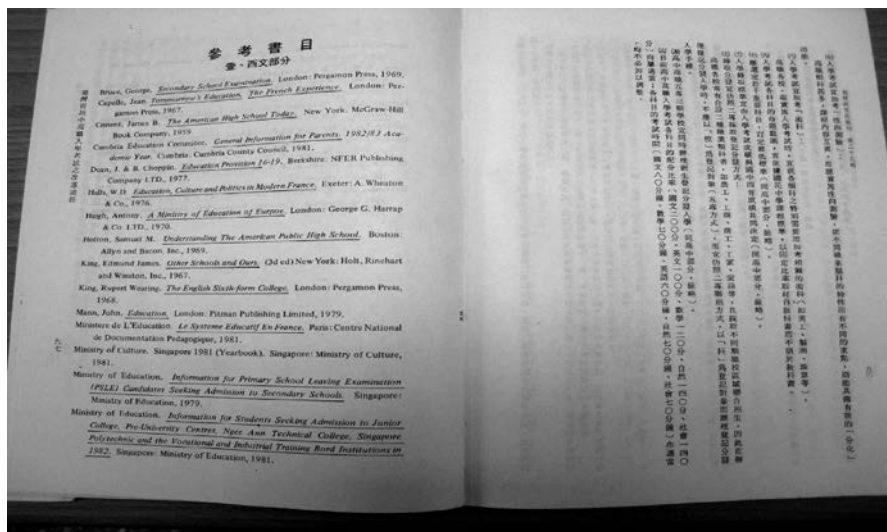


圖 6 正文直排，英文書目橫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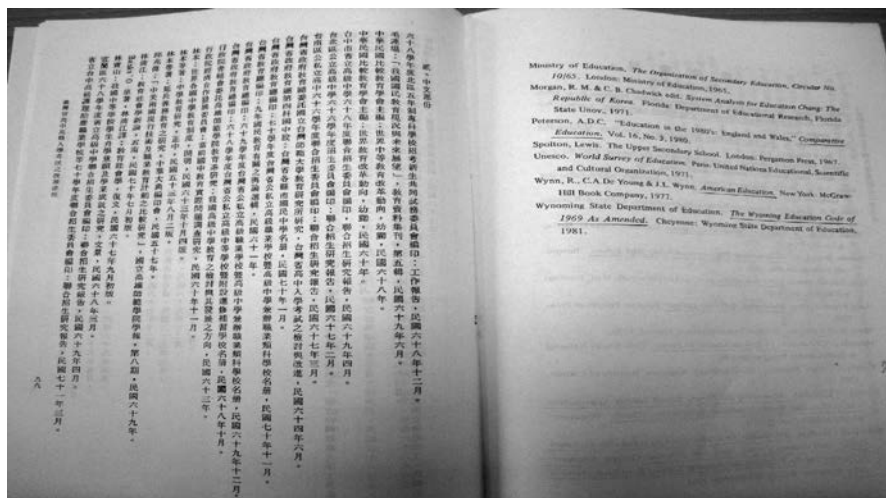


圖 7 與圖六同一篇論文的中文參考書目又改為直式編排

左頁至右頁，以橫式編排，顯示西方編排格式終獲最後勝利。

上述探討顯見，即使只是學術論文編排格式，也存在極大文化適應困難，一路走來相當顛踬。²¹至於學術思考的方法模式、對西方教育學說及其所由生之歷史社會脈絡進行深入理解與掌握，進而將其內涵與我國傳統教育文化價值理想融入等，此等挑戰之艱鉅，就更可想而知。

²¹ 另以《集刊》援引美國心理學會的 APA 論文引用格式為例。至 2007 年第 53 輯第三期為止，《集刊》徵稿辦法第六條規定「來稿附註及參考書目依循 APA 格式」（教育研究集刊編輯委員會，2007a:130），並對所有英語以外的西文文獻，嚴格要求翻譯為「英文」，例如該期朱啟華（2007）、劉蔚之（2007）兩篇以德文文獻為主之論文均按此辦理。此一要求實未慮及美國心理學會係針對其以英語為母語的主要讀者群而有此規定，然而，在中文讀者群為主的《集刊》中，舉例言之，將德文或西班牙文的論文、期刊、書籍翻譯為「英文」，其實意義甚微（依筆者淺見，若要翻譯，也以「中文」為宜；但即使如此，對不諳該外語的讀者進一步查找或閱讀該資料幫助並不大）。然自 2007 年第 53 輯第 4 期開始，《集刊》終改為：來稿附註及參考書目依循 APA 格式，「惟其他外文得用原外文方式呈現，毋須翻譯為英文」（教育研究集刊編輯委員會，2007b:146，徵稿辦法第六條），堪謂找回學術文化主體性的決定。

肆、教育學發展特性與問題（代結論）

近代中國教育學一百多年來的發展經驗，究竟該如何描述與解釋？教育學究竟可算是中學、西學的順利接軌，全新移植，抑或是被西方教育學取而代之呢？事實上，教育學之下，各分殊次學科研究領域在面對與學習西方教育學時，有著不同的接軌歷史經驗。本文在此擬借用一般對「文化」所做「器物工具」、「典章制度」、「精神價值」三個由外到內的層次區分，對「不同層次」教育學的接軌經驗加以廓清：

（一）「器物工具」層次的教育分支學科目不具轉型困難，很快即能以切合中國實用的西方課程、教學、測驗等運用在中國的教室情境。這一層屬於明確的「西方學術學習與延伸」。

（二）「典章制度」層次的教育學分支科目，做為有效能的西學、實學，很快亦被熱情、堅定地學習接受。所以，教育行政、教育財政、學校管理等科目亦甚早被引進中國，其表現也較為接近「西方學術學習與延伸」。

（三）涉及到「精神價值」層次的教育哲學與教育史，問題較為複雜。學者一方面熱衷於西方教育哲學與教育史之學習，但另一方面，傳統中國教育史、教育思想做為象徵文化傳統最後一塊堡壘，自是斷無棄絕之可能，於是產生的現象是，在師範學校課程與教學中保留中國教育哲史等科目，但實際上，中國教育史或中國教育哲學的研究，特別是在 1949 年之後的臺灣，逐漸相對稀少或不受重視。以《集刊》而言，特別是在第 6 輯（1963 年）以後所表現的銳減趨勢，相當清楚。因此，此一層次或許比較接近「傳統學術發揚與轉型」之意味，但「西方學術學習與延伸」現象，亦極鮮明。

另外，在《集刊》中，「教育哲史」研究更呈現出兩條平行軌道、缺乏交集的現象，「西方學術學習與延伸」屬於一軌，探究西方哲學與教育思想，頗著重將之援引介紹，其中僅部分作者嘗試運用於分析我國教育實踐活動，使本土情境與外來理論能產生關聯。至於「傳統學術發揚與轉型」一軌，集中在極少數學者的研究上，他們單打獨鬥，缺少共鳴，至為孤單。至於嘗試溝通兩軌的研究，數量極少，事實上也因至為困難，目前仍稱不上有所成就。而且這樣的研究需要的

是所有研究者的共識，不應是個別單一研究者隨興之所致的研究旨趣。

上述教育學的三個層次，以及本研究分析《集刊》中 50 年來教育哲史類論文內容與數量，共同表現出「西方學術學習與延伸」壓倒「傳統學術發揚與轉型」之景況，究竟是否合理？學者們對於這樣的發展是否感到滿意？應否繼續這樣走下去？目前與外國學者交流時，是否能感到一種學術與文化的自豪與自信？進言之，臺灣教育學未來「應有的、理想的學術造型」，又該是如何？本文僅能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就教於方家。²²

首先，理想教育學術造型，正如一國的教育理想，除需切合時代需要，更應建基於自身文化理想與價值。所以，臺灣教育學理想的學術造型應由自身的文化理想與價值出發，對於「傳統學術發揚與轉型」的工作，應透過培養學者的過程開始用心，並透過制度的鼓勵，吸引優秀有潛力的年輕學者投入此一領域之研究。

其次，「西方學術學習與延伸」並非不重要，反而應不斷深入理解與認識，且加以各種角度的批判與後設分析，明瞭各種理論學說的特長與限制，避免盲目移植援引之弊。更重要的是，需認識、警醒到外國教育理論學說與我國歷史、社會文化處境的各種可能關係，而非一面倒地加以推崇。如果只有這種純粹「西方學術延伸」的取徑受到學界肯定與讚揚，視為成熟而正統的學術研究（如認為能以此與國際學界對話），且以此為滿足，而不鼓勵學者進一步嘗試將這些西方理論與傳統文化加以融合、創新，我們的教育學將永遠呈現兩條平行而無交集的軌道。前述以賈馥茗為代表的「從傳統經典汲取教育智慧」與今日盛行的「純粹研究西方學術」，兩者各行其是。雖然兩種工作（軌道）之對話、互動以至融合，是最困難的部分，卻也是避免教育學出現中西分裂唯一的解決出路。臺灣教育學理想造型的塑成，若自 1902 年起算，至今仍屬牙牙學語期，還在摸索嘗試階段。這一趟交融創生的學術轉型壯遊旅程，未來還需耗時多久，尚難預料。

最後，我們應對於何謂臺灣教育學理想的學術造型，儘速建立共識。個人以為，它應具有融合中西文化價值與理想的特質，絕不只是西方學術的應用與延

²² 本研究一本至誠，力求客觀公允，並在論據充實前提下，勇敢提出自己的觀點與關懷，希不致遭主觀之譏。唯願藉此拋磚引玉，引發更多研究者就相關論題，提出各種研究結果與觀點，以碰撞激發更多思想火花。

伸。²³那麼，百年來教育學界是否曾經有人能做到融會中西文化，形成獨特的教育思想與理想，可供我們這些後學者做為模範呢？筆者個人以為，還是蔡元培一人而已。雖然本文忠實地記載《集刊》諸文對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正、負面批評，但是蔡元培融合老莊、Plato 與 Kant 思想而形成的恢弘、自由的教育理想境界，確有其宏遠、獨到之處。

除蔡元培的成就可稍為描繪這種境界之外，本文最後將眼光移到當代臺灣最重要的藝術團體——雲門舞集，以之為例說明本文心目中理想的中西文化融合，究竟是何樣貌。雲門舞集 2001 年起之《行草》、《行草貳》，以及《狂草》系列創作，結合東方、中國及臺灣的「當下」，形成獨特的「現代」，大膽地將做為中華文明精髓的書法藝術，透過特定身體模式與舞蹈互動交感，挑戰國際舞蹈界，形成獨一無二、另闢渠壑的成就，直可刺激整個國際藝術界、美學界重新商榷所謂當代文化之基本部署與定義（宋灝，2008）。

如果以一個力量有限的民間舞團，都能夠在短短數十年間有如此重大成就，「引發當代西方藝術美學重新思考」，甚而「轉向為對中華文明的瞻望」（宋灝，2008：32），臺灣的教育學術界又如何能不戮力以赴，做到「西方學術學習與延伸」及「傳統學術發揚與轉型」兼容並蓄的獨特理想學術造型呢？

致謝：感謝《集刊》前後任總編輯楊深坑教授及潘慧玲教授之鼓勵與邀稿，伍振鶯教授及周恩文教授之指正與建議，以及建國中學黃春木博士的潤筆與提點。

參考文獻

王文俊（1975）。精神與精神科學釋義。《教育研究所集刊》，17，27-38。

王文俊（1977）。人文主義與教育。《教育研究所集刊》，19，15-46。

²³ 本文在大方向上十分贊同鈕則誠（2005：86）倡議建構「華人教育學」，其本於「從人生看宇宙」的中國哲學進路，採「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為中心義理的「後現代儒家思想」，在「中體外用論」方法學綱領指引下，表現為一種「『哲學的教育學為體』、『科學的教育學為用』」之理論與實踐。此說甚具創見，值得進一步討論。或許藉由許多類似的提案與激盪，可逐漸形成學界共識或努力方向。

36 教育研究集刊 第 56 輯 第 2 期

- 王文俊（1978）。今日我國大學的使命。**教育研究所集刊**，**20**，37-55。
- 王文俊（1981）。青海興學記——創辦青海湟川中學經驗談。**教育研究所集刊**，**23**，1-24。
- 伍振鷺（1960a）。孟荀教育思想之比較研究。**教育研究所集刊**，**3**，141-188。
- 伍振鷺（1960b）。唐國子監隸六學考。**教育研究所集刊**，**3**，271-280。
- 伍振鷺（1962）。宋太學三舍法。**教育研究所集刊**，**5**，79-86。
- 伍振鷺（2008）。**中國教育史要略**。臺北市：五南。
- 伍振鷺、陳伯璋（1985）。我國近四十年來教育研究之初步檢討。**中國論壇**，**21**（1），230-243。
- 江合建（2001）。杜威藝術經驗理念之實踐。**教育研究集刊**，**47**，17-35。
- 但昭偉（無日期）。教育史哲的研究趨勢。2008 年 8 月 8 日，取自 <http://mail.tmue.edu.tw/~jauwei/55.doc>
- 吳美瑤（2005）。待完成的教育哲學體系——重建 1934-1937 年中國教育哲學發展史上的一段論爭。**教育研究集刊**，**51**（3），27-51。
- 吳康（1960）。道德基本概念——善惡與自由。**教育研究所集刊**，**3**，1-20。
- 吳康（1961）。孔子教育思想之完全人格——君子、聖人。**教育研究所集刊**，**4**，1-2。
- 吳康（1962）。墨子哲學思想述要。**教育研究所集刊**，**5**，1-3。
- 吳康（1963）。希臘民族及其哲學思想之起源。**教育研究所集刊**，**6**，1-10。
- 吳靖國（2008）。從「認識自己」到培育「英雄心靈」——論 G. Vico 的大學教育思想。**教育研究集刊**，**54**（3），1-32。
- 宋灝（Obert, M.）（2008）。當代文化與實踐——以臺灣雲門舞集為例。**思想**，**9**，1-32。
- 李崗（2006）。J. F. Lyotard 對 I. Kant 壯美觀的解構及其在情意教育上的省思。**教育研究集刊**，**53**（3），43-72。
- 李雄揮（1980）。蔡元培美感教育思想研究。**教育研究所集刊**，**22**，495-504。
- 周愚文（1986）。北宋的三次教育改革。**教育研究所集刊**，**28**，201-223。
- 周愚文（1995）。宋代的小學教育。**教育研究所集刊**，**36**，107-141。
- 周愚文（1997）。敦煌寫本《太公家教》初探——校勘與分析。**教育研究集刊**，**38**，128-181。
- 周愚文（1999）。臺灣近五十年來教育史學發展初探（1949-1998）。載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與教育部國家講座（主編），**教育科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頁 167-199）。臺北市：揚智。
- 周愚文（2003）。近五十年我國教育史學門研究之探討：1949-2002。**師大學報（教育類）**，**48**（1），1-14。

- 周愚文（2004a）。近二十年大陸教育史學門研究的量化分析。師大學報（教育類），49（1），91-101。
- 周愚文（2004b）。教育史研究方法上的四個概念性問題。載於張建成（編），文化、人格與教育（頁 133-152）。臺北市：心理。
- 周愚文（2007）。輝格史觀與教育史解釋。教育研究集刊，53（1），1-20。
- 林仁傑（2006）。解釋過去／了解現在／預測未來——論歷史研究的典範轉移及其對教育史研究的啟示。教育研究集刊，52（3），73-101。
- 林玉体（1976）。斯巴達及雅典的教育。教育研究所集刊，18，145-184。
- 林玉体（1991）。教育理論孕育期——希臘時期。教育研究所集刊，33，37-100。
- 林秀珍（2001）。「教育即生活」抑「生活即教育」？——杜威觀點的詮釋。教育研究集刊，47，1-16。
- 林秀珍（2003）。J. Dewey 教育目的論的辨明與詮釋。教育研究集刊，49（3），93-111。
- 林逢祺（1998a）。美感創造與教育藝術。教育研究集刊，40，51-72。
- 林逢祺（1998b）。美感經驗與教育。教育研究集刊，41，155-170。
- 林逢祺（2003）。由思維歷程透視教學原理：杜威《思維術》方法論之衍釋。教育研究集刊，49（1），1-29。
- 胡秋原（1960）。二十世紀初葉的西洋哲學。教育研究集刊，3，21-81。
- 徐光臺（1983）。邏輯經驗論的價值論及其在教育上的意義。教育研究所集刊，25，1-11。
- 高廣孚（1976）。論分析哲學對教育的影響。教育研究所集刊，18，45-76。
- 崔光宙（1981）。建構類型及其在教育理論發展上的意義。教育研究所集刊，23，263-277。
- 崔光宙（1988）。樂記篇源出考及美育觀。教育研究所集刊，30，87-111。
- 崔光宙（1999）。孔門情意教育觀之詮釋與實踐。教育研究集刊，43，41-64。
- 張淑媚（2008）。論德國教育學者 K. Mollenhauer（1928-1998）前後期思想的轉變。教育研究集刊，54（4），1-17。
- 張耀宗（2005）。本土化 vs. 荷蘭化——荷蘭時期臺灣教會的語言使用。教育研究集刊，51（3），83-99。
- 陳閔祥、洪仁進（2007）。追尋教學的藝術——從 J. Dewey 思想衍繹教師角色與教學的美感特質。教育研究集刊，53（1），87-118。
- 單文經（1998）。一八九五年以前鹿港教育史初探。教育研究集刊，40，113-142。
- 單文經（1999）。日據時代鹿港地區的教育活動。教育研究集刊，42，17-49。

38 教育研究集刊 第 56 輯 第 2 期

- 彭煥勝、吳正龍（2003）。清代彰化縣儒學的建置與組織。**教育研究集刊**，**49**（3），113-141。
- 彭煥勝、吳正龍（2005）。清代彰化縣儒學的生員教育。**教育研究集刊**，**51**（3），53-82。
- 程祿基（1960）。杜威教育思想研究。**教育研究所集刊**，**3**，205-258。
- 鈕則誠（2005）。**教育學是什麼**。臺北市：威仕曼。
- 黃光雄（1978）。蘭開斯特在美洲期間的導生學校運動。**教育研究所集刊**，**20**，327-340。
- 黃光雄（1986）。貝爾的生活與著作。**教育研究所集刊**，**28**，151-162。
- 黃振球（1959）。中國固有大學教育之演進。**教育研究所集刊**，**2**，63-98。
- 楊忠斌（2008）。T. W. Adorno 的倫理學及其德育意涵。**教育研究集刊**，**54**（2），1-29。
- 楊深坑（1980）。美育在文化建設中的功能。**教育研究所集刊**，**22**，357-375。
- 楊深坑（1982）。柏拉圖美育思想的概念架構及其歷史根源。**教育研究所集刊**，**24**，1-28。
- 楊深坑（1984）。教育學方法論的規範性與描述性。**教育研究所集刊**，**26**，99-124。
- 楊深坑（1985）。教育理論實踐的關係。**教育研究所集刊**，**27**，213-235。
- 楊深坑（1986）。教育學科學性之詮釋學分析。**教育研究所集刊**，**28**，33-73。
- 楊深坑（1987）。教育學經驗科學化之歷史評述及其後設理論分析。**教育研究所集刊**，**29**，45-75。
- 楊深坑（1988）。意識型態批判與教育學研究。**教育研究所集刊**，**30**，25-56。
- 楊深坑（1989）。西德師資培育制度之歷史回顧與展望。**教育研究所集刊**，**31**，29-55。
- 楊深坑（1995）。後傳統認同與文化多元主義。**教育研究所集刊**，**36**，215-228。
- 溫明麗（1995）。台灣之現代化：乏自主性自律之教育。**教育研究所集刊**，**36**，229-251。
- 溫明麗（1997）。批判性思考即為通識教育。**教育研究集刊**，**39**，16-26。
- 賈馥茗（1970）。教育學的方法論。**教育研究所集刊**，**12**，13-40。
- 賈馥茗（1972）。教育的適應性及不變性。**教育研究所集刊**，**14**，1-25。
- 賈馥茗（1977）。從「學」「庸」中所見的教育「準則」和「情懷」。**教育研究所集刊**，**19**，1-13。
- 賈馥茗（1985）。東周以前的教育狀況。**教育研究所集刊**，**27**，5-39。
- 賈馥茗（1986）。我國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一）。**教育研究所集刊**，**28**，1-18。
- 賈馥茗（1987）。我國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二）。**教育研究所集刊**，**29**，1-26。

賈馥茗（1988）。我國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三）。**教育研究所集刊**，**30**，1-24。

賈馥茗（1989）。東周的教育及學術思想（一）。**教育研究所集刊**，**31**，1-28。

賈馥茗（1990）。東周的教育及學術思想（二）。**教育研究所集刊**，**32**，1-27。

賈馥茗（1991）。東周的教育及學術思想（三）。**教育研究所集刊**，**33**，1-35。

賈馥茗（1992）。東周的教育及學術思想（四）——儒家教育思想之承傳與體系之完成。

教育研究所集刊，**34**，1-32。

賈馥茗（1994）。東周的教育及學術思想（五）。**教育研究所集刊**，**35**，1-23。

趙雅博（1960）。詹姆斯的實用主義。**教育研究所集刊**，**3**，97-126。

趙雅博（1961）。西洋近代哲學上的新與舊。**教育研究所集刊**，**4**，3-11。

趙雅博（1962）。奧古斯定以前的教父思想。**教育研究所集刊**，**5**，5-13。

趙雅博（1964）。存在主義評價。**教育研究所集刊**，**7**，1-66。

趙雅博（1965）。哲學理論體系的選擇。**教育研究所集刊**，**6**，1-11。

劉蔚之（2007）。德國文化教育學在中國的接受與轉化——兼述其在日本的傳播。**教育研究集刊**，**53**（3），93-127。

劉蔚之（2008）。複製移植或交融創生？德國教育學在中國與臺灣傳播的歷史回顧（1928-1983）。**教育研究集刊**，**54**（4），19-51。

劉子菁（2007，1月）。臺灣近五年來教育史的研究與課程（2002-2006）。論文發表於澳門大學教育學院舉辦之「兩岸四地教育史」論壇，澳門特別行政區。

歐陽教（1976）。認知結構與教學的關係。**教育研究所集刊**，**18**，77-143。

歐陽教（1980）。宗教信仰的德育和反德育涵義。**教育研究所集刊**，**22**，331-356。

歐陽教（1990）。教育的概念、口號及隱喻。**教育研究所集刊**，**32**，29-49。

歐陽教（1992）。宗教與教育的關係。**教育研究所集刊**，**34**，33-42。

簡成熙（2005）。臺灣教育哲學的回顧與前瞻：1949-2005年。**教育資料與研究**，**66**，1-24。

蘇永明（1996）。郭爾堡的道德認知發展論評析。**教育研究所集刊**，**37**，155-170。

蘇永明（1999）。臺灣教育哲學之發展：從國際化和本土化來衡量。載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與教育部國家講座（主編），**教育科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頁251-275）。臺北市：揚智。

蘇永明（2000）。臺灣教育哲學的回顧與前瞻。**教育研究**，**70**，54-62。

Schriewer, J. (1999). Konstruktion von Internationalität: Referenzhorizonte Pädagogischen Wissens im Wandel Gesellschaftlicher Systeme (Spanien, Sowjetunion/Russland, China). In H. Kaelble und J. Schriewer (Hrsg.), *Gesellschaften im Vergleich* (S. 151-258). Frankfurt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BER/?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a. M.: Lang.

Steiner-Khamsi, G. (2002). Vergleich und Subtraktion: das Residuum i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Globalem und Lokalem. In H. Kaelble und J. Schriewer (Hrsg.), *Vergleich und Trasfer. Kompararistik in den Geschichts-, Sozial- und Kulturwissenschaften* (S. 380-397). Frankfurt a. M.: Campus.